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北方先秦考古研究

杨建华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北方先秦考古研究

杨建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到公元前200年的秦帝国建立这一时段历史的研究。这一时空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鲜有涉及,目前主要通过考古学来研究。本书首先通过考古资料展现了物质文化面貌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墓葬殉牲与民族学资料讨论了这一地区从农业经济到农牧混合经济最后到游牧经济的变化;其次从墓地资料讨论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然后从人骨鉴定结果讨论了人群构成的变化和不同人群的融合;最后根据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相似的器物讨论了草原金属之路的交往。

本书适合中国及欧亚大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先秦考古研究 / 杨建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ISBN 978-7-03-045048-7

I. ①北… II. ①杨… III. ①考古—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①K871.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2935号

责任编辑: 赵 越 / 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3/4

字数: 400 000

定价: 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

自序

本书是我自1997年开始学习“中国北方先秦时代考古”以来发表的论文选集。由于这些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所以自己作序。我把这些文章收录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查找，而且这些论文体现了我从事这一领域的学术经历和成果体系。

中国北方先秦时代主要是指北方长城沿线，可以分为甘宁地区的西区、内蒙古以及晋北、陕北的中区和燕山南北的东区。这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是与中原相同的农业文化，本书涉及较少。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到公元前200年左右秦帝国的建立是农牧混合经济到游牧经济文化，这一阶段以青铜时代为主，晚期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本书首先从东区入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冀北周代青铜文化初探》《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在从事考古研究的同时，我随导师林沅先生学习古代文献，主要是《春秋》和《左传》。当时先生发表的《戎狄非胡论》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从文献讨论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方面，春秋时代的文献与考古遗存的条件比较充分。我在学习青铜时代考古之前一直是从事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的，很少涉及文献，所以我的文献基础基本是大学毕业的水平。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春秋》与《左传》等文献，并按照导师的要求把所有涉及“狄”的文献摘录下来。我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写成了《〈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这篇小文。文献记载狄在早期经常与齐国和邢国打仗的事实，说明狄人不可能居住在内蒙古长城地带，所以内蒙古地区春秋时期的遗存不应该是狄人遗留的。我的博士论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对东周北方进行了系统地分期以及文化趋同性的讨论，但是对于留下这些遗存的人群没有涉及。我脑中萦绕的问题是，如果春秋的戎狄和战国的胡不是直接发展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北方春秋与战国之际没有见到很明显的文化断裂？从文化面貌的角度看，中国北方文化带也不完全一致，靠南面的与中原联系多，靠北面的与草原联系多。于是我就从已经在文献上可以证明是狄的中山国的遗存中入手，寻找北方文化因素，一直追到了西周晚期关中的戎，这些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有北方文化因素的遗存很可能就是戎狄遗留下来的；在更北方的则是胡。这两者在时间与分布上有差异，相互间有交往，因此这种交替没有形成明显的文化剧变。这些观点见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的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从陕北给北方文化带打了一个剖面，靠南的为狄人遗存，北面的神木地区与内蒙古的

文化面貌相同，为胡人。新近发表的《陕北出土青铜器》中南部的动物形带钩与北部带扣的差别就是两种人在装束上的差别（见《陕北青铜器研究与文物保护的新成果——〈陕北出土青铜器〉读后》一文）。

我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最终目的是想展现这一地区如何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变成了东周时期的游牧文化的过程，这里既包括了文化面貌的变化，还有经济类型的转变。在经济类型研究方面我最先是受到王明珂先生文章的启发，了解到通过考古学讨论经济类型的一些方法，后来得到“王宽诚基金”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了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西伯利亚17~18世纪游牧人群的记载，以及科林·伦福儒教授在剑桥麦克唐纳研究所编辑的几部欧亚草原会议论文集的序中对欧亚草原经济类型发展四阶段的精辟总结（见《欧亚草原的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撰写了《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随后我参加了张忠培先生的国家文物局项目《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跟随先生在陕北、晋北和内蒙古中南部进行了实地考察，使我对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最新的考古调查资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内蒙古地区是我研究的重点。我对内蒙古地区今后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见《内蒙古先秦时代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在考古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墓葬殉牲的数量、种类、年龄和性别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前提是，殉牲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畜群情况。畜群构成是由当地环境、动物习性以及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例如西部干旱地区以养羊为主，东部降雨多些，有一定数量的牛。在这方面，民族学调查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在北方地区和蒙古国调研时经常关注这些问题，如一个人徒步放牧和骑马放牧的数量；羊群中可以作为头羊的山羊与绵羊的比例；以山羊为主和以绵羊为主地区的环境差别；以食肉、食用乳制品和获取羊毛为主的畜牧类型在屠宰年龄与性别方面的差异；在内蒙古地区过度放牧的草场与蒙古高原充沛的草场所宰杀牲畜的年龄差别，等等。我还在海拉尔地区的牧民家做过调查。我发现尽管社会发展水平变了，但是环境和动物习性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早年的调查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社会组织与发展阶段是我研究的新领域。这要得益于两件事情：一是近些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和林格尔和凉城岱海地区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墓地，资料统计全面，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二是在2007~2008年我得到了路斯基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的资助，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与林嘉琳教授合作期间，见到了讲学的俄罗斯匈奴考古专家米尼亚耶夫，我向他请教伊沃尔加匈奴墓地时，他指出这些排列有的像毛庆沟南北向墓葬那样成对排列。他的话启发我从墓地排列出发研究社会结构。在研究中，我发现中国北方的古中原人、古华北人和北亚人在家庭结构和随葬品表现的性别差异方面是不同的，是由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决定的（见 *Gender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Xiongnu” as Reflected in Burial Patterns* 和《试论内蒙古东周时期不同族群的性别差异》）。

我在中国北方研究领域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这个问题在我的博士论文中略有涉及，但是十分有限。答辩过程中，导师们指出了我的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得不进一步地了解欧亚草原的资料。中国学者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还是从中国的资料出发，到境外寻找与中国相似的器物加以比较，但是对这些相似器物在境外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理解很少。这种研究模式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我进行了换位思考，即从欧亚大陆的视角看待中国北方，按照区系类型的理论把中国北方作为欧亚草原的一个区域来对待。在匹兹堡大学听了汉克斯博士给研究生讲授的《欧亚草原考古》，拓宽了我对整个欧亚草原从新石器到匈奴时期年代框架的大视野。在这个基础上，我重点对亚洲草原各时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探讨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联系以及形成这种联系的原因（详见最后一部分论文）。在即将要出版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东西方交往以及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形成。

在将近二十年的学习与研究中，我在中国北方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方面做了以上工作，这个研究过程如同滚雪球一样逐渐丰满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有我自己的努力，有导师的引领，也有一些很好的机遇，还有提供丰富考古资料的考古学同仁。在这里我真诚地感谢你们！也希望这一领域像我的导师在为我的博士论文作序时期许的那样：盼望中国北方草原考古的春天快快来临！

杨建华

2015年春

目 录

壹 燕山南北

冀北周代青铜文化初探·····	(3)
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	(16)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36)

贰 东周文化带及戎狄与胡的讨论

《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	(53)
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的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	(61)
三叉式护手剑与中国西部文化交流的过程·····	(94)
陕北青铜器研究与文物保护的新成果——《陕北出土青铜器》读后·····	(105)

叁 游牧经济的出现

欧亚草原的经济类型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评介·····	(111)
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119)
内蒙古先秦时代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128)

肆 墓地社会结构分析

Gender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Xiongnu” as Reflected in Burial Patterns·····	(137)
试论内蒙古东周时期不同族群的性别差异·····	(156)

伍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交往

从晋陕高原“勺形器”的用途看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在御马器方面的联系·····	(175)
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	(183)
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	(215)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布	(223)
欧亚草原和中国新疆与北方地区的有銎战斧	(245)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考古科研成果目录	(271)
后记	(274)

壹

燕 山 南 北

冀北周代青铜文化初探

河北北部山地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从商代的青龙抄道沟到战国的怀来北辛堡，北方青铜文化传统延续不断，其中属于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发现最为集中，并与西部的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南部的中原文化以及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往的考古研究历来重视这一地区^[1, 2]。但从发现情况看，早期主要是国内外的收集品，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一些零星的遗址发掘，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了有计划的遗址发掘，但这些发现至今尚未充分发表。因此还没有把河北北部的青铜文化遗存作为一个单位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尝试，以期建立一个基本的时空框架结构并进行初步的文化性质分析，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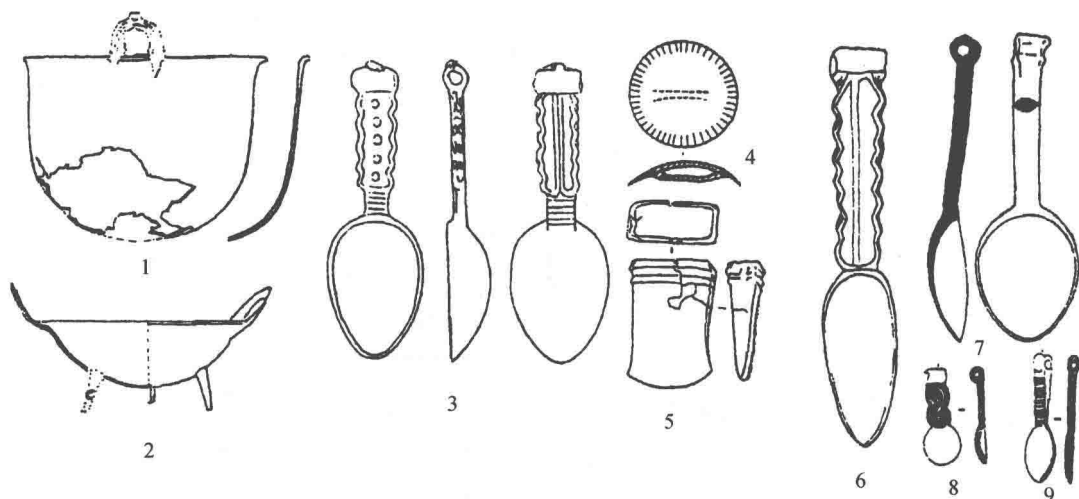
河北北部属于周代的青铜文化遗存，依据其文化属性和年代，可分为五群。

第一群：以昌平白浮墓中的北方式青铜器为代表^[3]。这一群遗存在河北省境内还见于兴隆县的小河南遗址^[4]。在辽宁省建平县烧锅营子村^[5]也有类似遗存。这群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并向北越过了燕山到达辽西地区。通过对昌平白浮墓的研究可知，其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这种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菌首或兽首、茎部镂空、格下有凹槽的剑。这种剑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中常见。因此这类遗存应与北方草原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6]。同时，这类遗存还对年代更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白浮的剑与夏家店上层典型的銎柄剑有联系^[7]，并且对东南沟类型的平首剑也产生过影响（详见下文）。根据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推测，这类遗存在这一地区存在过一段时间，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随着冀北考古发现的增多，很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这类遗存。

第二群：以延庆西拨子窖藏^[8]为代表。这类遗存目前虽然仅见一例，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了相当于辽西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在河北北部并不是空白，而是存在以西拨子为代表的遗存。从出自窖藏的铜鼎上的重环纹可知，它的年代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M101^[9]基本同时。

通过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拨子遗存是与夏家店上

层文化南山根类型基本同时并有着一定联系的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从联系方面看，西拨子有着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同的器类，如铜匙、铜刀、铜斧、铜泡和猎钩；从差别上看，西拨子的铜匙的柄上有精致的纹饰，南山根的匙柄是素面（图一，3、7）。这种柄部有纹饰的铜匙还见于冀北后来的宣化小白阳M33和M19（图一，8、9）^[10]和后来的鄂尔多斯地区（图一，6）^[11]。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匙很可能是受其西部冀北地区影响的结果。两者的铜斧也并不同（图一，5）。夏家店上层的比西拨子的更长且窄，更加规整。边缘有放射线纹的铜泡是两地基本相同的器物（图一，4），但这种铜泡的分布范围很广，延续时间很长，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并非哪个文化所特有。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炊器。西拨子遗存的居民使用铜釜和三足圜底铜鼎（图一，1、2），在发现较多居址和墓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不见。它是以特有的陶鬲和少量中原的礼器作为炊器。这种炊器的区别说明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更发达的定居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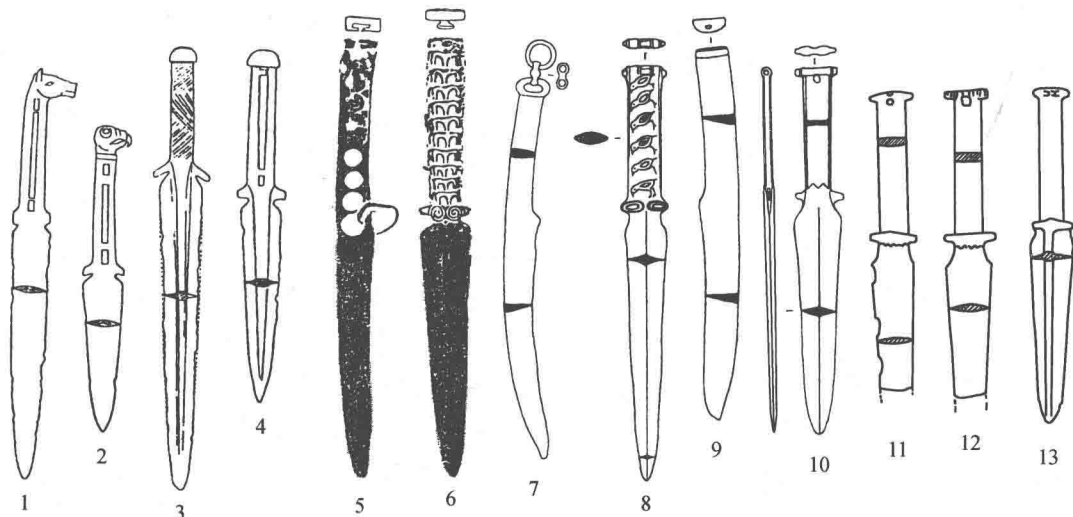


图一 西拨子、小白阳、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地区的铜器

1~5. 西拨子 6. 鄂尔多斯 7. 南山根M4 8、9. 小白阳

第三群：以平泉东南沟^[12]为代表的遗存（这种石棺形制还见于丰宁土城镇^[13]）。这类遗存中最有特点的是剑和刀，它的柄端是一个长条形平顶（有的侧面有一个凸纽或凹窝），有的柄端略宽于茎部。我们把这种剑暂时称之为“平首剑”。在这种剑的茎部通常流行纵向成排的动物纹。

这种剑最早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类型^[14]，但它只是这一类型的一种剑，到了东南沟遗存时期，它才成为重要的剑的形式，并出现了同样形式的刀（图二，5、6）。按照这一标准，宁城的天巨泉M7301和瓦房中M791（图二，7~10）^[15]也属于这一类型。另外还有零星采集的这一类型的剑（图二，11~13）^[16]。东南沟出土的刀和剑的茎部都有纹饰，瓦房中M791的刀和剑均为素面，与这两个墓共存的戈的形式说明东南沟的年代早，很可能茎部有纹饰的早于素面的。平首刀和剑多分布



图二 平首剑和刀及其来源

1~4. 白浮墓 5、6. 东南沟 7、8. 天巨泉M7301 9、10. 瓦房中M791 11~13. 旧热河山地

于辽宁省南部的宁城县和河北北部与之相接壤的旧热河山地，如平泉、承德、青龙等地。从已经发表的平首剑的地点看，这种剑的分布较集中，主要在辽宁和河北交界地带，因此应当是从本地发展起来的。从冀北更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中可以发现，昌平白浮剑的剑格下有凹槽，这与平首剑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菌首变成了平首，茎部的凹槽纹变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的成排动物纹（图二，1~4）。这种动物纹不仅见于平首剑，还见于其他剑和刀的柄部^[17]，而且也不限于这一地区。它西至陕西的宝鸡^[18]、北到欧亚草原^[19]，应当是一个很大范围内的时代风格。

从这一类型的典型器物平首剑和刀以及与之共存的器物来看，东南沟遗存应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这个文化南部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他类型的区别在于它受到了当地更早的昌平白浮类型的影响。它和中部的南山根类型、北部的龙头山类型^[20]的差别随着距离的增加和年代的推移而逐渐递增，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从北向南的发展过程。东南沟类型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南、年代最晚的地方类型。南山根类型的年代被定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因此东南沟类型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

第四群：以延庆军都山东周墓地为代表。这类遗存遍布冀北地区。重要发现有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21]、滦平县窑上^[22]、茆子沟^[23]、梨树沟门^[24]、虎什哈炮台山^[25]、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光^[26]、怀来县甘子堡^[27]、北辛堡^[28]、张家口地区宣化小白阳^[29]、庞家堡白庙^[30]等地。

这类遗存的主要特征是土坑竖穴墓，多为东西向，以牲畜的头、蹄殉葬。随葬品组合为剑、刀、镞；牌饰、泡饰、带钩、带扣；斧、铤、凿、锥及锥管、马具，并有各种质料的串珠。陶器分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两大陶系，后者是受中原影响的结果。少数大墓还有中原青铜礼器。这样一种器物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与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

化和西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反映了这些人群之间联系的加强。但如果详细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反映了当地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的区别,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一群遗存发现的比较多,分布的地域与延续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我们在下文详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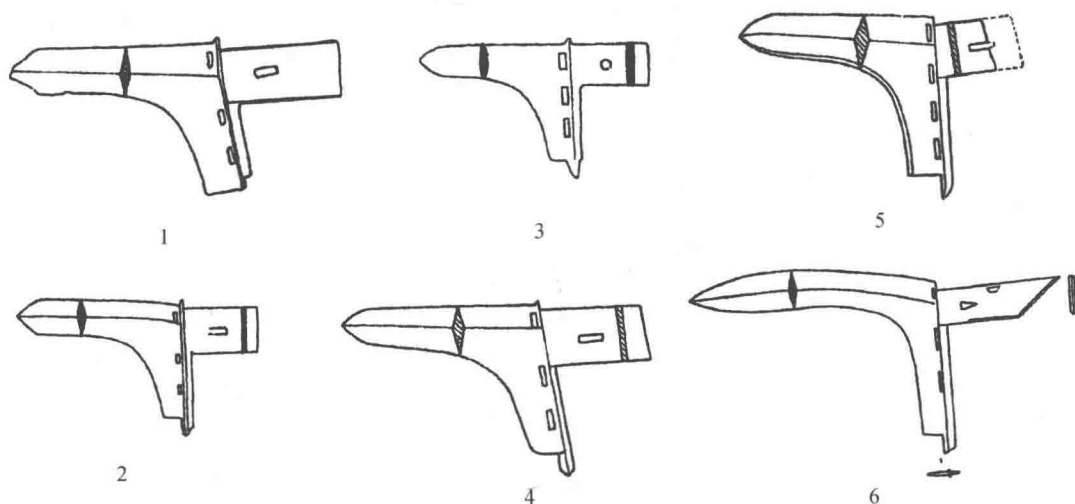
第五群:以围坊东台子^[31]、丰宁凤凰镇^[32]、张家口白庙第四、五类遗存^[33]为代表。这一群属于中原的燕文化,说明了燕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时已经基本占领了整个冀北地区。有关这类遗存,最关键的是它的年代问题。它对于我们了解燕国开发冀北和北方青铜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消失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张家口白庙第四、五类遗存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承德平房墓葬的莲花铜壶、错银铜尊、戈、陶壶、玉壁,被定为燕国中期^[34]。承德^[35]和滦平^[36]发现了几批燕国的刀币以及灰陶绳纹陶片。承德滦河镇出土的中原式陶器被认为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37]。围坊的东台子已达到战国末期秦代初年了。在围坊县边墙村发现的燕国长城^[38],它可能是与赤峰南部相连的燕北长城。《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燕昭王时(公元前311~前278年)开始修筑长城。从以上这些发现可以看出,从战国中期晚段开始,燕文化拓展了它的西北界,逐渐取代了冀北的第四群遗存,战国晚期燕文化扩展了它的东北界并到达了辽东地区。燕文化占领这一地区的详细过程随着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将会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二

第四群遗存是冀北青铜时代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这使我们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研究成为可能。这群遗存的分布西至张家口地区,东至滦平、隆化地区。它的西边是以桃红巴拉墓葬^[39]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南边是中原的燕文化,东北边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孑迹。这些周边文化对这群遗存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造成了这群遗存内部的不同类型。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张家口地区为代表的西部类型,以怀来、延庆为代表的中部类型和以滦平、隆化为代表的东部类型。西部主要是受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如陶器中耳部高于口沿的双耳罐,铜器中有圆形、中部鼓起的小铜管,铜匙多见,器表为涡纹的联珠形牌饰。从西区的发展看,西部因素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中区受到中原燕文化的强烈影响,从青铜礼器、武器、工具逐渐到陶器(虎什哈的陶豆),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逐步渗入,而且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势头;东区受到原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的影响,有夏家店上层典型的釜柄剑(图四,25)和当地双环首与曲刃剑身相结合的双环首曲刃剑(图四,26)。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有特点的齿状刀不仅在东区,而且在这类遗存分布的整个地区都有发现。夏家店上层的影响主要出现在第四群遗存的早期,随着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结束,这种影响也随之逐渐减

弱了。但东区柱脊剑的流行仍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釜柄剑影响的结果（图四，27、32~35）。

冀北第四群遗存不仅分布范围大，而且延续时间也较长。戈的形态演变说明它们有进一步分期的可能（图三）。同时，军都山东周墓地的发掘简报也报道了一些分期的结论，我们可以作以参考。研究者认为整个墓地处于春秋时代，下限可延至战国早期。它的早期以Ⅰ、Ⅱ式剑（图五）和Ⅰ、Ⅱ式刀（图四，15、16）为代表，晚期为Ⅳ式剑和Ⅲ、Ⅳ式刀。从这个结论中可以看出，剑和刀的茎部均是由花纹装饰向条棱纹或素面发展。最晚期的刀身变宽短，刀尖像尖首刀币，这与北辛堡墓地M1的刀（图四，24）已经比较接近了。按照这一分期标准，再考虑到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风格的器物均为早期特征，可以大致作一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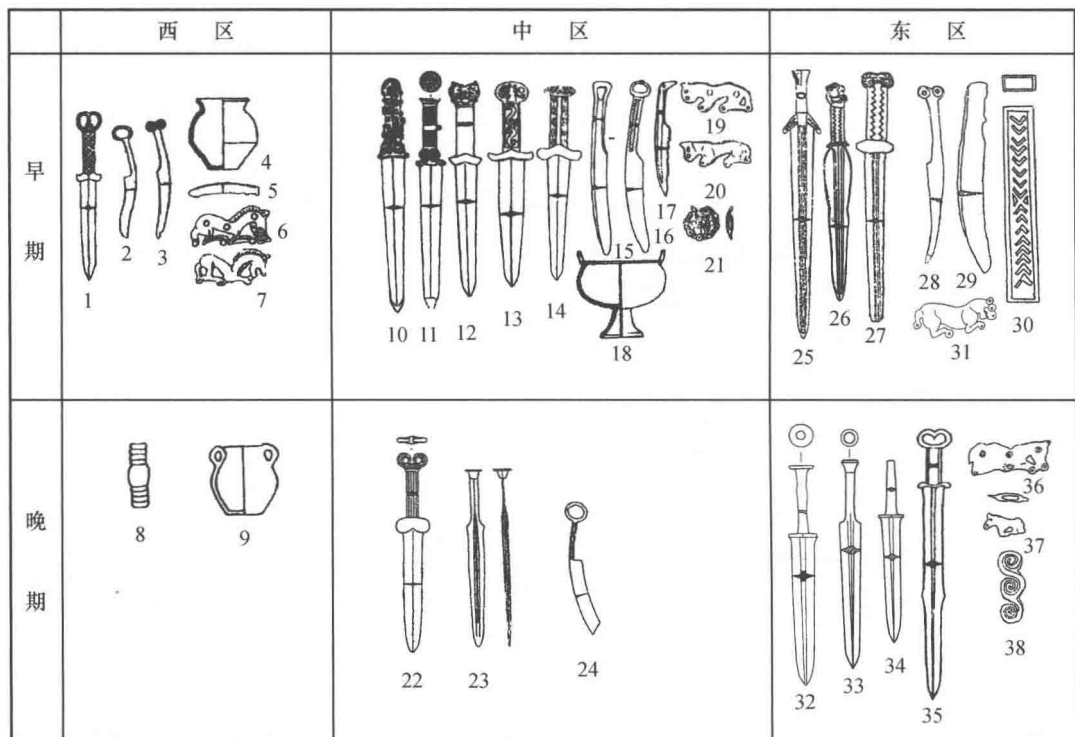


图三 铜戈的演变

1. 玉皇庙 2、3. 甘子堡 4、5. 梨树沟门 6. 北辛堡

西区早期为宣化小白阳墓地，这个墓地的年代比较一致，说明使用时间不长。有齿状刀、双环首刀（图四，5、3），前者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后者见于柳林高红^[40]，年代都较早。这个墓地短剑茎部多有纹饰（图四，1），削刀较细、翘尖（图四，2），陶器均为鼓腹罐（图四，4）。牌饰中有其他地区少见的马形牌饰（图四，6，7）。西区晚期为白庙墓地，陶器以双耳高领罐为特征（图四，9），与内蒙古凉城崞县窑子相同^[41]。小铜管（图四，8）与桃红巴拉一号墓的相同。这些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年代均在春秋晚期以后，因此白庙墓地应属于西区的晚期遗存。

中区甘子堡青铜礼器中的圈足盘（M1：5）和匜（M1：6）是春秋早期的器物，青铜短剑中茎部有纹饰的约占2/3（图四，10~14），而且兽首刀（图四，17）占有一定比例，所以这个墓地的大部分墓葬应属于早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墓地中出土了两把茎部有繁缛蟠螭纹的“秦式剑”、豆形釜及一些铜制和金制的虎形饰（图四，



图四 第四群遗存的分区与分期

1~7. 小白阳 8、9、10~14. 白庙 15、16. 军都山 17~21. 甘子堡 22~24. 北辛堡 25. 隆化M1 26. 隆化M2
27. 下甸 28、31. 茆子沟M8 29. 骆驼梁M8 30. 骆驼梁M1 32~38. 梨树沟门

10、18~20)。在虎的关节部有圆孔。这种风格也见于铜泡饰上(图四, 21)。这种蟠螭纹和虎牌饰见于甘肃宁县宇村的西周铜器墓中^[42]。剑上的蟠螭纹比甘子堡的较为简单, 虎牌饰的纹饰具有典型的中原作风, 年代比甘子堡的早, 为西周晚期。同时, 第四群遗存的铜釜和虎牌饰又多见于河北省太行山东麓的保定、石家庄以西丘陵地区与中山国有关的遗存中。甘子堡墓地中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说明这个遗存代表了这群人中间的贵族阶层, 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基地的区别。怀来北辛堡,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 属于最典型的晚期遗存(图四, 22~24)。军都山东周墓地虽未发表正式报告, 但从简报中我们可以看出, 它既包含了这群遗存的早期, 又包括了它的晚期, 反映了这群遗存发展的大致过程。

东区早期遗存包括了隆化三道营村骆驼梁M1、M5、M8, 滦平茆子沟M18、M16, 滦平窑上和滦平梨树沟门部分含齿状刀的遗存。东区的早期特征主要体现在齿状刀、双环首刀、釜柄剑和环首曲刃剑上(图四, 29、28、25、26)。这一阶段仍受夏家店上层文化遗风的影响, 尤其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南沟类型的影响。但从锥管和虎牌饰(图四, 30、31)等遗物看, 又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很大区别,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南沟类型和冀北第四群遗存东区的早